

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与朝鲜 问题必须区别开来解决^①

(1950 年 7 月 9 日)

周 恩 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加入联合国各组织问题必须与朝鲜问题先行区别开来解决。联合国各组织只要仍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在内而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从而使苏联代表亦不可能出席，则其一切重大决议均将是非法的。这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当然是毫无法律效力的，并且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为消除产生这种非法行动的根源，并使安全理事会适当地发挥其职能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欢迎印度政府对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加入联合国各组织，特别是加入安全理事会所欲努力的意愿。只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出席之后，一切合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问题，才能合法地被提出

^①此件系《对印度大使关于朝鲜问题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加入联合国各组织问题的谈话的口头答复稿》，周恩来起草，最后一句为毛泽东审阅时所加。

讨论。到那时,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制止美国侵略台湾问题,也才有提出解决的可能。在此原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印度政府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见解。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周 恩 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之，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

过去一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奠定了在朝鲜实现停战的基础。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中，双方代表除对战俘一项问题外已对所有问题达成协议。首先，对于举世关心的朝鲜停火问题，双方已经同意，“双方司令官命令并保证其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

员,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此项敌对行为的完全停止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生效。(《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十二款》)其次,双方还会商定各项重要停战条件。在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二公里,以便在敌对军队之间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以防止发生可能导致敌对行为复发的的事件。”(《草案第一款》)在关于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处理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指派的五名高级军官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指派的五名高级军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包括对于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督导,并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草案第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五十六各款》)双方并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提名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提名的瑞典、瑞士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在其下配备由上述各国派出的军官为组员组成中立国视察小组,分驻于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各口岸,以监督与视察双方对于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和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条款的实施(条款中准许轮换和替换者除外),并得至非军事区以外据报发生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地点进行特别观察与视察,以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草案第三十六、三

十七、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各款)。此外,双方还商定“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草案第六十款)

如上所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只有一个战俘问题阻碍着朝鲜停战的实现。而且就在战俘问题上,除战俘遣返问题外,双方在停战协定草案中对于有关战俘的安排问题的一切条款亦均已达成协议。如非朝鲜停战谈判中断五个多月之久,则这个战俘遣返问题可能早已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了。

现在联合国军方面既然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解决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关于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有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特别是该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才是合理的解决。但是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本着一贯努力于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持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准备采取步骤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促成朝鲜停战。为此目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必须指出，我们这一提议，并非放弃了日内瓦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的原则，也非承认了联合国军方面所说的战俘中有所谓拒绝遣返的人，只由于终止朝鲜流血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关系到远东及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才采取这一新的步骤，准备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提议在停战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而不致因此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

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结束朝鲜战争所采取的这一新的步骤，完全符合于有自己子弟在朝鲜作战的双方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完全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联合国军方面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话，我方这个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

忆周总理 1964 年访苏

阎 明 复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给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带来一线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同苏共新领导接触，试探有无改善关系的可能。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随团担任翻译工作。每当回想起那次令人难忘的出访，我总是感慨万端。为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约我写一篇回忆总理的文章。我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又请教了当年参加翻译工作的王钢华，把零碎的记忆收拢起来，整理成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此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论战。到 1964 年，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这场论战也随之愈演愈烈。在短短 1 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报刊上就发表了 2000 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这年 2 月，苏共还召开了有 6000 人参加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反华决议并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信函，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从 1963 年 9 月开始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

信,到 1964 年 10 月已发表了九评。

在此期间,苏共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我们理所当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建议”,断然拒绝停止公开反驳苏共对我们的攻击。接着,苏共中央又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则主张经过充分准备,召开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的国际会议,而决不参加苏共的分裂会议。对此,苏共中央答复,起草委员会一定要在 1964 年年内召开,12 月 15 日之前就要报到,并表示无论哪个党缺席,委员会也要开始工作。中共中央在答复信中谴责了苏共中央这种破坏协商一致原则的独裁主义,重申绝不参加分裂会议的立场。

在中苏两党的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每一件函件除提供了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了俄文译本。而由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我们的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联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的工作,都是我们中办翻译组承担。随着双方论战的日趋激烈,我们在翻译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确无误,避免翻译中的用词不当造成“节外生枝”。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前面提到 1964 年 2 月苏共中央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了一封谴责中共的信,这封信并没有发给中共,但很快这封信的内容就被中共中央所获悉。于是,中共中央于 1964 年 2 月 20 日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痛斥“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

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指出：“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惟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翻译中，我和翻译组的几位同事在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颇费了一番脑筋。“ТРЕБОВАТЬ”和“ПРОСИТЬ”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是用前者还是用后者意见不一致。最后是用‘ТРЕБОВАТЬ’这个语气强硬的词。第二天即 2 月 22 日，苏共中央很快就答复了。显然，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词使苏共领导大怒，他们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对这封信，中共中央于 2 月 27 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以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说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 2 月 12 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 2 月 12 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至于“要求”一词应该怎样用俄文表达为妥,是否由于译成“ТРЕБОВАТЬ”而起上火上加油的作用,留给专家们去考究吧。只是从上述这个小插曲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

1964 年秋,正值中苏论战进行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我们刚发表了“九评”,从苏联方面突然传来了赫鲁晓夫被撤职的消息。10 月 15 日深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约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受权在住所会见了。契尔沃年科通报了苏共中央于 10 月 14 日召开全会,决定满足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出辞去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并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推荐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消息传来,毛主席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苏联的局势和我们的对策。当时苏联政局还不明朗,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也不清楚。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华政策究竟如何也有待澄清。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认为,赫鲁晓夫被撤职毕竟是件好事,我们应该表示欢迎;要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同时,要观察一个时期,而且在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的反对,该弃权的弃权。

为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以便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

首先,10 月 16 日,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周总理指示外交部草拟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给勃列日

涅夫、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的贺电,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苏共和苏联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并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份电报当天就送给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当晚广播,并于第二天(10月17日)见报。

第二,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祝活动 同苏联领导接触 并倡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苏联,以便进行接触,交换意见。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总理亲自会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把中共中央的建议通知他们。10月28日,周总理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请他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建议派团去祝贺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并同苏联领导同志进行接触。10月29日,周总理再次接见苏联大使,说: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我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以便进行接触;并建议苏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去莫斯科。

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立场,周总理于 10月29日首先接见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古巴五国的使节,向他们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倡议,说明这一倡议的目的是寻求团结。当时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已经断交,所以,周总理还特别向阿尔巴尼亚大使解释中共中央倡议的意图,并分析了可能产生的结果。阿大使说,他将报告阿党中央,但他相信阿中央不会派人去苏联。对此,周总理表示理

解。

10月30日,周总理接见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和民主德国的驻华大使,向他们转达了同样的建议。次日,苏联大使转告周总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

第三,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扩大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的规模。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节日贺电。11月6日,首都各界举行了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协副主席刘宁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11月7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彭真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即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8日的报纸还登载了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11月5日,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副团长为贺龙,团员有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等,顾问有姚臻、王力、余湛等。我和王钢华、邢书钢等作为翻译随团前往。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11月6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周总理表示,我们这次来访,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出访前,在国内已经准备好了周总理在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周总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希望能在大会上致

词，勃列日涅夫以大会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讲话为托辞婉拒。当天下午，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我党政代表团其他同志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勃列日涅夫作了报告。

11月7日，我代表团在红场观礼。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和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阅兵式及群众游行队伍。当时，莫斯科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苏联领导人都身穿着厚厚的皮大衣，头戴皮帽子，还时不时地到列宁墓下的休息室喝咖啡、喝酒取暖。周总理穿着单薄，里面是灰色中山装，外边是一件黑色呢大衣，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站就是3个多小时。我站在他身后，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生怕他冻病了。周总理的卫士长高振普拿了厚厚的皮大衣在下面休息室等候。我几次建议总理换上皮大衣，总理都坚持说不冷，不用换。莫斯科市民的游行队伍走过来了，游行的人群看见观礼台上的周总理和贺龙，都高高地举起小旗帜欢呼着向中国代表致敬。

这天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酒会。大厅的主席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为主宾桌。苏共中央领导和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沿长桌站着。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康生站在主桌旁，我和王钢华、邢书钢分别给他们作翻译。大厅的两边离主桌约10米处，分别摆了很多餐桌。苏联其他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分别站在这些餐桌旁边。主席台左边的第一个餐桌旁站着苏军的高级将领们。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中间的罗科索夫斯基、崔可夫等都认识。酒会开始后，勃列日

涅夫致词。过了片刻,勃列日涅夫把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找来,把麦克风拉到他身边,让他祝酒。马林诺夫斯基讲话冗长,其中还抨击了美国的政策等等。不少外国记者走到前面来录下了他的讲话。

马林诺夫斯基的祝酒辞结束后,周总理建议贺龙副总理一起去看看苏军的老朋友们。周总理走到苏军将领们的餐桌旁,我紧随在他身后。苏军元帅和将军们看见周总理走过来,纷纷和他握手,十分热情。大家为中苏传统友谊碰杯。

贺龙副总理走到主席台旁,王钢华跟着去作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看见贺龙副总理,一开始就有意挑衅。他说:“我们的元帅服太浮华,我喜欢战士的短袄。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们的是毛(指毛主席,下同)胡造的。”

贺龙说:“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说完,他就转身走向周恩来和其他苏军将领们那边去。

马林诺夫斯基跟着走过来,嘴里不住地嚷嚷着:“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耍政治魔术,不要让任何毛、任何‘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翻译给周恩来和贺龙副总理。周总理听了大怒,推开马林诺夫斯基,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去。

马林诺夫斯基仍在后边嚷着:“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而你们要把毛搞掉(УБРАТЬ MAO)”。

我听到前半句,立即翻译给总理听,却没有听清后半句。王钢华听到这句话,正要翻译给总理,我驻苏使馆翻译张大可赶过来,对王钢华讲,潘自力大使要他转告周总理,

在场的美国记者在录音。这样就把后半句漏译了。

这时,有几位苏军元帅大声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而扎哈罗夫元帅则接着说:“每种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时候。”

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

勃列日涅夫说,马林诺夫斯基是喝醉了。

周总理说,酒后吐真言么!

总理要求对方道歉。说完,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

代表团来到我驻苏使馆,连夜给中央起草电文,报告发生的严重事件。

为了把事情搞准确,总理还要我们几个翻译到一起,反复核对事情的经过。当我们讨论到扎哈罗夫说的“每种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时候”这句话怎么理解时,王钢华说,他是接着马林诺夫斯基“你们要把毛搞掉”的话说的。这时才发现当时我们漏译了马林诺夫斯基这句话。于是,我们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漏译的经过。总理叫我们把整个过程写出来。我和王钢华连夜赶写,并在书面材料上签了字,交给总理和代表团。

返回别墅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拜访时,周总理又向他们追问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周总理说,苏共

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总理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 11 月 8 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 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 他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我们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线,等等。周总理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公然提出“推翻毛泽东”,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苏关系和缓的可能性,而且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11 月 9 日、11 日和 12 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总理首先提出,希望苏联领导人说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勃列日涅夫敷衍搪塞,拒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把话题转到停止公开论战上去。周总理谈到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这也是当时我们同赫鲁晓夫争执不下的问题。我们主张推迟召开,赫鲁晓夫则下命令必须在 1964 年 12 月 15 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5 年 5 月召开大会。周总理说,我们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并未成熟 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

结的兄弟党的会议是一回事，而坚持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分裂的会议是另一回事。重申我们主张开团结的大会，反对开分裂的大会。而且迄今为止，已经有 7 个党决定不参加 12 月 15 日的会，其中包括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等国的党。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却仍然坚持要在 12 月 15 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也不讲什么道理，采取了绝不妥协的态度。在激烈辩论中，米高扬终于忍耐不住，脱口而出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最后，周总理正式表示了意见：

他说，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辞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 12 月 15 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